



統計工作叢書(2)

馬克思列寧統計

東北計劃委員會統計局譯印

— 35 —

統計工作叢書之二

# 馬克思列寧與統計

東北計劃委員會統計局編印

1951

統計工作叢書之二  
馬克思列寧與統計

譯 者 東北計劃委員會統計局  
出 版 者 東北計劃委員會統計局出版部  
印 刷 者 長春新報印刷廠第二廠  
發 行 者 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  
經 售 全國各地新華·三聯書店

1951年6月初版

定價人民幣3.80元

No. 1-10,000

## 統計工作叢書序言

自從東北人民政府決定加強統計工作，半年多來東北區各部局、各省市都建立和健全了統計機構，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統計工作經驗，製訂和審定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統一報告的統計表格，展開統計工作。但是在統計理論方面，過去我們對於馬列主義著作的統計部份翻譯介紹的却很少。我們知道統計理論是指導統計工作，對做好統計工作是有決定意義的。因此我們決定選擇蘇聯有關統計的文章翻譯介紹出來，編輯成『統計工作叢書』出版，藉以幫助各地學習提高統計業務。

社會主義的統計學，是與舊的資本主義統計學有着本質上的區別。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它是被統治階級所掌握，用來掩飾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以及反對勞動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一種工具，所以他們抽象地撥弄許多複雜的數學原理和公式，用這種虛偽的科學企圖歪曲事物的本質和其發展規律。而新的社會主義統計學，則是以馬列主義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一種科學；在蘇聯三十多年社會主義建設中，它已發揮了計算與監督的作用，並且其本身亦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充實。現在，它成為有着嶄新內容的一門獨立的科學。

但是對我們來說，這種新的統計還都不大熟悉。在現階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我們需要努力學習這種新的科學。而過去學過舊統計學的人們，為了以新的科學批判和揚棄舊的知識，重新武裝自己，更有加強學習新統計學的必要。

本叢書中所收集的文章都是具有工作指導意義的，可以作為財經部門工作人員，和統計工作人員的業務學習讀物，亦可作為各專科學校的統計課程參考之用。

『統計工作』編委會

## 目 錄

馬克思、恩格斯與統計	1
列寧與統計	32
斯大林與統計	51
論統計分組法	66

# 馬克思、恩格斯與統計

卡石卡列夫

列寧在其紀念恩格斯的一篇文章裡，曾經這樣寫道：『可以用兩三句話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工人階級的功績表示出來，那就是：他們不但教導了工人階級自知和自覺，而且還把空想變成了科學』（『列寧全集』，第四版，第2卷，六頁）。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統計學，已經成了工人階級認識自己的工具之一和認識社會的有力武器。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和哲學方面所完成的變革，使統計學的本質和作用、內容和方法，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闡明了統計學的階級性，他們說統計學是一種黨性的科學。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佔領導地位，乃是與資產階級統計學根本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科學的新統計學的基礎。

作為一種獨立科學的統計學，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同成長起來的，是與政治經濟學緊密聯系中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在論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揭露了它的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古典政治經濟學從配第開始，便是研究資產階級生產的內在依存關係的。

馬克思寫道：『配第覺着自己是個新科學的創始人，他說他的方法是「非凡的」。但他並不把那比較級和最高級的許多字句和理論上的根據結合在一起，而竟用那數量、重量和尺度來加以說明，專門利用那種來自感性經驗的根據，僅僅研究那些在性質上具有顯

然根據的原因。他勸別人要來研究為各個人的智慧、見解、希望和熱情所左右的各種原因』（『馬恩全集』，一九三五年版，第XII卷，第三九頁）。

對於研究社會經濟的依存關係來說，學會用數量來說明經濟現象的本身以及它們中間的依存關係，是很重要的。

配第（馬克思稱他為政治經濟學之父，而在某些方面則稱他為統計學的發明者）研究了資產階級各種關係的內在依存關係，結果，使他建立了政治算術。

恩格斯對於配第用數量來說明經濟現象依存關係的這一創舉，非常重視。恩格斯批評杜林時，曾經這樣寫道：『這也是當然的事，因為擺臭場面的學究似的庸夫，對於最天才的而且最特出的經濟研究家，只能表示自己怒氣沖沖的不滿，只能埋怨，為什麼理論的閃光沒有高傲的、齊整地、作為早已準備好了的「公理」表現出來，而只是靠着「粗雜」的實際材料的探究，例如租稅問題的探究，散亂地表現出來。』

杜林先生對於配第的純粹經濟的著作採取這樣的態度，杜林先生對於配第是「政治算術」（通俗地說，就是統計）之創造者的這一事實，也採取同樣的態度。他對於配第所用方法的奇特，只是惡意地聳聳肩頭。……如果我們想到，現在的統計，還是如何遼遠地離開配第所提出的目的，那末，這一種在兩世紀後自以為高明的驕傲，就只是表現出它自己的絲毫不能粉飾的愚蠢』（恩格斯著『反杜林論』，吳理屏譯本，三聯書店版，第二六八頁）。配第在研究統計資料的時候，廣泛利用了分組法、平均值和相對值。他藉助於這些方法去研究『粗雜的材料』。

配第著作中的統計學，是進步的，是唯物主義的，因為它的目的在於用計量和比較的方法來研究客觀存在的經濟現象和其中間的關係。

配第的經濟研究和其他『政治算術』上的主要缺點，就是他對

待被研究的社會經濟現象和對待非歷史現象一樣，都抱有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政治算術』並未看到：它們所研究的現象和依存關係，只是一定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所特有的。

馬克思教導我們說，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不但階級鬥爭愈趨尖銳和露骨，而且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甚而在局限的範圍內也不再是科學的東西了，它逐漸成了庸俗的和卑劣辯護性的東西了。『一八三〇年發生過一次經濟危機，它是比較具有決定性的。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從這時起，無論實際的階級鬥爭和理論上的階級鬥爭，其方式也就表現得愈益險惡了……。以後成為問題的，不是真理與非真理的問題，只是對資本有益或有害、便利或不便利、違背警章或不違警章的問題……。真正的科學考察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論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惡的意圖』（馬克思著『資本論』，中文本，郭、王合譯三聯書店版，第一卷，七頁）。

除了辯護資本主義和衛護它的永存性而外，資產階級學者們的思想，便更加向着下面的方向走去，即通過各式各樣的捏造方法，為維持政治平衡和粉飾資本主義的真實情況而配製藥方。在這方面起着積極作用的，就是那種以庸俗政治經濟學、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為依靠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統計學。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裡，資產階級統計學的最顯要的代表者，就是快特萊。快特萊認為他的任務就是要給政治科學和精神科學附加一種以觀察和計算為基礎的方法。但是，身為形而上學的唯心論者的快特萊，並不去研究經濟現象及其發展規律，把它們當作一種歷史範疇來看，而竟集中力量去說明，社會現象和天體運行相同，都是受那種永恒法則的支配的。據快特萊的理解和發揮，他說統計學乃是社會物理學。至於社會物理學，據他說，『……應當研究那些鞏固人類和社會制度並使社會制度成為第二天體力學的存續法則，而社會制度的神秘基礎，則由宇宙創造者巧妙地安排妥了』（快特萊著『社會制度及支配社會制度的法則』）。

快特萊利用那正確到千分之一的大數法則定理，計算結婚、犯罪、自殺等等的趨勢，結果得出一種平均人的類型。快特萊曾常加研究的平均值，便成了他說社會秩序穩固的一個證據。快特萊說道：『我在這裡所觀察的人，在社會中，猶如物體的重心一樣，他是一個平均數，各個社會成員都圍繞他搖擺不定……』（快特萊著『社會物理學』，一九一一年版，第一卷，第五四頁）。

據快特萊說，所有的人，無論具有或大或小的偏差（誤差），都是一種平均人的類型。他把這種類型叫做『我們種族的類型』。

這位唯心論者快特萊在研究上的出發點，就是他所創造的『平均人』這一概念，凡實際生存的人，都與它或多或少有『偏差』。

我們在快特萊的這種理論裡，即能看出那種完全澈底反動的、非科學的現代資產階級統計學的一切萌芽來。快特萊認為：統計學是萬能的科學，而其對象就是人類各種知識中具有變化性的各種現象。

認識那種『支配着社會現象』和超時間而存在着的法則的方法，在快特萊說來，就是機率論。於是，伯爾努伊和拉蒲拉斯的定理，便成為他證明所有社會生活方式的不變性和永久性的方法了。至於機率論，在他說來，也就是認識一切社會現象的方法；他說，離開機率論是不可能認識這些現象的。

在資產階級統計學家們的著作中常機械地、非科學地應用機率論去研究社會現象，關於這一點，拉法格（馬克思的學生和同時代人）曾如下寫道：

『快特萊和包阿森……是兩個數學家，他們以沒有十分把握的希望，企圖利用司法統計資料，最後給機率論方法的應用取得一種實際的結果……他們研究了犯罪和犯罪者的數字，但不注意孕生它們的社會條件，他們把犯罪和犯罪者數看作是一種論理上的層層推斷，這正像等差級數和等比級數一樣，所謂靠自身的內在力量擴

展起來。他們復活了（當然是以極其緩和的形式）畢達格拉斯的學說，即把玄妙的屬性附加於數字之上的學說』（拉法格全集，第二卷，一九二八年俄文版，三四六頁）。

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出現以後，我們才有權利來談論真正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統計學的發生和發展，才有權利來談論它與資產階級的統計學、即以形而上學和唯心論為基礎的統計學進行的鬭爭。

馬克思主義統計學在其基礎上是完全否定資產階級統計學的基本原理的，同時又是完全否定藉以衛護這些原理的全部武器的。

但是，這並不是說資產階級統計學所建立的一切，都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拋棄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了由科學所達到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

我們需要指出：在我們的刊物上和科學著作中，對於闡明統計科學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發展問題，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未予以足夠的注意。某些統計學教科書的著者們指出說：統計學是一種階級性的科學，但在教科書中敘述這門科學的歷史時却很少反映統計學的階級性。對於辯證唯物論和唯心論、形而上學在統計學中的鬥爭，闡明得還很不夠。在某些著作中，著者們『客觀地』說明資產階級統計學家的著作內容時，他們並未指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對於新的馬列主義統計學的發生和發展所起的巨大的決定性作用，他們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對資產階級統計學展開的批評，緘默不談。

形式主義方向的統計學家們在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統計學時，只去摘取個別文句和定義。某些統計學教科書在頭幾頁裡就引證馬克思主義奠基者們關於經濟分析的作用、關於政治經濟學是統計學的基礎的語句，但其後在同一些教科書中敘述統計學史的時候，却把它看作是機率論的發展和應用的歷史而加以敘述，反而與統計學的理論基礎——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毫無聯系。這

種事實不是偶然的，這完全是由於站在錯誤的立場上去理解統計學的對象和方法而產生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與形而上學（它把現象的相對穩固性變成了絕對的穩固性）進行鬭爭時，也不得不去揭穿那些證明社會現象穩固性的統計方法，特別是揭穿那些對大數法則和平均值的形而上學的論述。

資產階級的學者們爲了從數字上證明資本主義世界的永存，於是對平均值和大數法則便賦予了特殊的意義。資產階級的統計學家們並不能認識現象的本質，而且在大多數情形下也不希望去認識現象的本質（註），他們認爲事件與平均值的偏差，是受大數法則支配的，他們把平均值看作是現象的永恒不變的類型。

馬克思在研究價值範疇、平均生產價格、平均利潤、平均社會必要勞動等等，以及當研究某些經濟現象的發展水平而利用平均值時，他指出了平均數在社會過程分析中所具有的認識作用的意義和界限。

馬克思指出過：把大數法則看成支配現象波動性的法則，是錯誤觀念。現在我們把馬克思的一段話引證在下面：

『各生產部門的商品皆依照價值售賣的假定，當然不過包含這樣的意思：即，這個價值成爲一個重心，商品的價格是在這個中心的周圍擺動，它不絕傾向於均衡化而上下漲落』（馬克思『資本論』，郭、王合譯本，三聯版，第三卷，一二六頁）。

我們從馬克思的學說中可以得出下列的結論來：並不是大數法則『支配』着圍繞平均值的波動性。在資本主義下價格與價值背離之相互抵銷，是在價值法則（它是資本主義經濟盲目過程的基

註：萊克西斯是以其企圖奠立穩固論基礎而出名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關於他，恩格斯曾經說過：『……他是一個名利主義者，因而他就裝作一個庸俗的經濟學家』（馬恩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XIV卷，六〇三頁）。

礎) 的作用下實現的。

在科學的分析中，有兩個研究階段。第一個階段：記敘和記錄現象，例如記錄市場上的商品價格。這種用「數量和尺度」進行的必要的現象記述，給進一步的研究創造了材料。但是這個分析階段還是不够的。我們僅僅知道價格波動着和價格的波動範圍，還不够；我們僅僅像快特萊一樣，只計算出這種波動是圍繞平均值而實現的，這還不够；我們還需要確定出支配着這種波動的法則；還需要揭露出爲什麼價格發生波動，以及它圍繞着什麼東西而進行。快特萊和資產階級統計學家的代表者們，在利用大數法則時，無論怎樣擴大他們的觀察範圍，也是不可能回答這些問題的。

在我國出版的某些統計學教程中，引證了被著者曲解了的馬克思的個別語句，他們並且利用這些語句爲形而上學的原則建立基礎，如：大數法則是統計學的基礎，現象有特殊的統計規律。

例如，在中等專科學校用的統計學教程（著者葉若夫、卡岡斯基等人）中，引證了馬克思的下述文句：『市場價格一時比那起着節制作用的生產價格高，一時又比它低，可是這種偏差是互相抵銷的。如果我們從多少長一些的時期來看價格表，除掉因勞動生產率變動而使商品的實際價值發生變動以及因某些自然災害或社會災害而使生產過程遭到破壞的情形，那麼，給我們很深的印象的，首先是偏差的範圍相對的狹窄，其次是這種偏差很有規則地彼此平衡。我們在這兒遇着快特萊在社會現象方面會指出過的那種起着節制作用的平均數的統治』（加着重點特別標出的地方在該教程中並未引用——卡註）（馬克思『資本論』，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Ⅲ卷，七五八頁）。

著者們從引證的文句中，得出了下面的結論：『馬克思着重指出說：這些波動的規律性就是快特萊所發現的那種規律性，即統計規律性』（葉若夫、卡岡斯基著『統計學教程』，一九四七年俄文版，二四〇頁）。著者們企圖利用馬克思的話去找出馬克思和唯心

論者快特萊在理解社會過程上的共同性，藉以奠定統計規律這一形而上學範疇的基礎。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馬克思並未把價格波動藉以均衡化的規則解釋成『統計規律』（像該教程著者們隨着快特萊而說的那樣），而是解釋為現象自身的法則。馬克思的解釋和資產階級統計學家、特別是快特萊的說法之間的原則上的區別，也正在這裡。關於快特萊，馬克思說過下面的話：『……他證明了：就是在社會生活的似乎是偶然性的中間，由於它們的週期復現性和週期平均數，它們是具有內在必然性的。但是它對這種必然性的解釋是完全失敗的』（馬恩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X X VI卷，七頁）。如所週知，快特萊對於他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所觀察的數字（犯罪的百分比等）的反複性，是用神賦給人們的玄妙的嗜好來解釋的。

在該教程著者們所『減縮』的那段馬克思的文句中，包含着對數字週期復現性原因的寶貴解釋：只有在社會經濟條件（各該現象發生於其中的）不變或變化很小的情形下，數字的週期復現性才是可能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過：這種推定，雖在某些情形下是一種必要的科學抽象，但却是有條件的。恩格斯在談歷史事件的表面上的偶然性和作為這種事件的基礎的法則時，指出過：使社會歷史發展法則擺脫『……玄妙的形式並呈現出它的真面目和全體性』（馬恩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X IV卷，九頁），乃是他們和馬克思所提出來的任務之一。

×

×

×

唯物論認為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東西，它是能被認識的。唯物論的這種基本原理也表現在對現實的研究方法上和表現在為此研究目的而利用統計上。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指出過：他的著作的最終目的，是揭露近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的經濟法則。馬克思指出過：人類社會的解剖應該在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並且着重指

出：人——這首先就是社會性的存在。

關於政治經濟學和統計學在科學研究中的聯系和作用，馬克思曾在致恩格斯信中寫道：「關於地租學說……我要說明如下：

(一) 我在理論上唯一要證明的事情，是絕對地租不破壞價值法則也是可能的……

(二) 關於絕對地租是否存在問題，在各國，好像都是一個要由統計解決的問題」（資本論，第三卷，三聯版，七七二頁）。

政治經濟學和統計學在經濟分析中是相互聯系和彼此補足的，並且政治經濟學是基礎，而統計研究應該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過這一點。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研究利潤率下降傾向的問題時，寫道：「並且，又只有先瞭解利潤率所依以形成的各種關係，然後可以把統計應用在各時代各國家的工資率之現實的分析上」（資本論，第三卷，郭、王合譯本，一八〇頁）。馬克思和恩格斯與經濟問題研究中的單純的經驗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鬭爭，與那些以統計資料的整理來代替理論分析的情形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為了確定統計學的對象、統計學與政治經濟學的聯系，為了發展真正科學的統計研究方法，對於數量和質量的統一給以辯證的理解，是有極大意義的。

馬列主義的奠基者們，要求對現象作全面的分析。現象的相互依存關係的研究方法，質變（它是數變積累的結果）的研究方法，是馬列主義科學統計學中的基本的東西。這正和事件的機率研究方法相反（資產階級統計學的力量都用在機率研究方法的發展上了）。

×

×

×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深刻研究統計資料，非常注意。例如馬克思爲了寫『資本論』中談工人立法的二十個頁文章，會研究了英國工廠監督官的全部『藍皮書』叢書，並且對於能從這種統計中抽出

的一切最重要的東西，都作了詳盡的總括。馬克思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在致庫格曼的信中寫道：『當我不健康的時候……我不能夠寫，但是我却讀了大量的統計「資料」和其他「資料」』（馬恩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X X V卷，五一六頁）。

恩格斯為了說明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曾研究了大量統計資料，他還把這些資料用個人的觀察和個別的事實加以補充。

列寧和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是這樣做的。我們想一下下面的情形就足夠證明了：只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本著作中，列寧就利用了大約五百種統計資料彙集。

科學的統計學的奠基者們，在各種各樣的著作中，由『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資本論』開始，直到關於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歷史問題各方面的論戰文章，都引用了統計資料。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本身，首先就已證明了他們對於統計資料具有非凡的知識，證明了他們批判地估價和巧妙運用統計資料的情形。與馬克思同一時代的人們認為：馬克思在統計知識方面是無比的。例如別茲利教授（他寫過關於共產國際史的論文）說過：『協會的成就應以馬克思博士的功勞最大，依我看來，他的歷史知識和對於歐洲一切國家中工業動態統計的知識是無比的。本文中包括着的資料，在很大程度上……我應歸功於他』（馬恩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X VI卷，第二部，二〇三頁）。

馬克思根本未作過統計資料的俘虜。實際資料對他的用處，是爲了深刻的、更加大大前進的理論總括。馬克思的同時代的人們着重指出過：『……馬克思擁有極廣泛的學識，但他並未沉迷於他所累積的大量未加工的材料裡，而是主宰了這種材料……並且用天才的思想闡明了這些材料』（『莫斯科電訊』，一八八三年，三月七日至十九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爲自己的工作綿密地積累了統計資料，從這些資料裡給自己創造了基礎，這不僅是爲了當時他們所從事的研究，

而且還給未來的工作創造了資料。無數的統計數字摘抄，淵博的統計資料來源提要，都證明了這一點。

常常有許多人請求馬克思給他們介紹各種問題的資料來源。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他們認為最好的統計彙集。例如，一八五一年十月十六號馬克思給威捷邁爾寫道：『我向你介紹……馬克·蓋洛克的「商業辭典」，一八四五年出版……還有更新的書，如馬克·戈列高爾的書，他的統計手冊大概是全歐洲最好的。但這些書都很貴』（馬恩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ⅩⅤ卷，一一三頁），接着馬克思又指出了許多國家的統計資料。

馬克思和恩格斯爲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不得不利用資本主義的統計資料，但他們總是以批判的態度對待每一個數字。他們第一個着重指出了並揭露了資產階級統計的辯解性和捏造性。

恩格斯在研究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時（當時英國的統計被認爲比歐洲其他國家都好些），寫道：『工廠主……甚而發表很詳細的表，以證明機器並不排擠成年男工。這些表一般都滲雜着歪曲了的數字，不可靠的數字……這些表並不談各種最重要的問題，它們只證明着作者（工廠主）的盲目利己主義，證明他們沒有良心』（馬恩全集，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Ⅱ卷，四三一頁）。

關於農業的資料所受到的歪曲也不小於工業統計中的歪曲。馬克思在『歐洲的食糧缺乏』一文中指出：『關於法國的發狂一樣的關心，可根據其虛偽的收穫報告判斷出來』（馬恩全集，一九三三年俄文版，第Ⅷ卷，二〇六頁）。

比較不能對比的資料，乃是資本主義統計學喜歡運用的捏造手法之一。這種手法已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一再揭露過了。馬克思指出過：如果不考慮每一個國家的特殊性，『如果不把這些國家裡存在着的各種關係加以必要的對比』（馬恩全集，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一卷，二六五頁），就不可以比較各種國家（如英國、法國、普魯士）的資料。

特別受到捏造的，是那些標誌工人階級狀況和勞動人民狀況的資料。捏造的程度隨着階級鬥爭的增長而增加起來；資產階級學者手中的統計學，更加成了資本家們為保存現存制度而鬥爭的工具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章中，說到企業的分工時，加了這樣一個註釋：『……但國會的報告，却不但明白把技師機械師等等，並且把工廠監工、營業員、職員、外勤職員、貨棧員、包裝員等等包括在內——總之，除工廠主外，一切人都包括在工廠勞動者中了。這種混淆，是統計蓄意將真相蒙蔽的特徵』（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王合譯本，三四〇頁）。故意歪曲了『工廠工人』的概念，於是就能夠作出任意的、對資本家有利的工人生活水平等等的結論來。

馬克思指出過：『隨着資本的積累而階級鬥爭也跟着發展起來的時候……官方統計也就成了更加騙人的指標了……』（馬恩全集，一九三七年俄文版，第XVII卷，七一八頁）。

這是馬克思大約在九十年前說過的話。從那時起，資本主義統計學的捏造資料的技巧日見改進一直成了非科學的、辯解性的東西。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利用了那些往往對極重要問題並沒有回答的資本主義統計資料，他們還極力自己直接地獲得需要的資料。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曼徹斯特生活和工作時，靠着訊問工人而獲得了某些數字資料。恩格斯為了獲得關於德國無產階級的資料，曾製訂了一些詳密的問題提綱（各地應按這些問題提綱，填送一些報導、『記述和統計劃記』，給恩格斯和蓋斯一八四五年在德國創辦的『社會之鏡』社會主義雜誌）。關於這個雜誌，恩格斯曾通知馬克思說，這個雜誌預定提供一些關於社會的貧困情形和資產階級制度的情形。恩格斯認為這些報導的任務，在於幫助『……專以事實為根據……正確闡明一切階級的社會關係……』（馬恩全集，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I卷，五九五頁）。

恩格斯叫人們特別注意記述勞動的性質，各種有害健康的勞動